



▲隨着AI進入政府、金融等關鍵基建，數據主權等治理已成為全球科技競爭不可或缺的一環。
資料圖片

經濟觀察家

當一個地方宣稱擁有「主權AI模型」時，較少被追問的問題是：如果明天模型出錯、受到攻擊或需要更換，社會有沒有能力處理？主權模型可以是一個名詞，主權能力卻必須化為一連串動詞；前者關乎擁有什麼，後者關乎真正做得到什麼。

「主權AI模型」考驗政府治理能力



近年主權AI成為全球科技競爭的關鍵詞，這股趨勢有其必要性。當AI進入政府、金融、醫療、教育及關鍵基建，一個地方不能把敏感數據、核心能力、價值判斷與最終決定權，毫無保留地交給外部平台。主權模型提醒我們：可以擁抱世界，但不能把方向盤一併交出去。

公共責任不能外判

真正值得追問的，不只是香港有沒有有一個主權模型，而是香港有沒有能力審查、更換或重建任何用於公共領域的模型，並保留數據控制、規則制定、獨立評測和最終問責。擁有一個主權模型而缺乏這些能力，就像買下一輛跑車，卻沒有駕駛執照、維修技師和備用零件——鑰匙在手，真正決定能否上路的，仍然是能力。

香港近年已建立本地大模型與應用研發能力，這是重要的第一步。然而，任何「建得出」的能力，都必須配上「管得好」和「換得到」的制度，否則單一項目的成功，也可能轉化為整個生態的脆弱。技術研發可以由政府、企業、大學、科研機構或開源社群承擔——參與者愈多元，生態愈健康——但公共責任不能外判給任何一方，無論這一方多麼值得信任。擁有者的身份，不能構成治理標準的折扣。

這項原則並非對任何開發者缺乏信任，而是成熟制度的基本設計。制定規則、供應模型、執行評測與作出採購決定，不宜由同一方包辦。核數、藥物審批和金融市場均重視角色分隔，因為結構性重疊即使出於善意，也會削弱公信力。AI治理同樣需要利益申報、適當迴避和第三方驗證，讓規則對所有參與者平等適用。

透明度亦不能簡單理解為把所有源碼、參數和數據向全世界公開。首先要問，向誰透明？監管機構需要掌握數據治理、模型測試、權限配置和事故紀錄；開發者與專業使用者需要了解模型限制、版本變更和評測方法；一般市民則應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與AI互動、資料如何使用、答案依據何在，以及出錯後如何更正和申訴。不同對象需要不同程度的透明，重點不是人人看見一切，而是每個負責任的人都取得履責所需的信息。

國際上已有可供參考的公開標尺。史丹福大學基礎模型透明度指數，以一百項指標評估主要開發者在數據、模型、運算資源、使用情況和

下游影響等方面的披露；其2025年研究亦指出，開放權重與透明度相關，卻不足以自動證明模型全面透明。香港若要建立可信AI樞紐，可發展本地化公開評分制度，要求所有進入公共採購或高風險服務的模型，不論開發背景，都在同一把尺下接受檢視。標準的價值，不在於指向誰，而在於平等適用於所有人。

評測本身也要可信。任何模型宣稱在本地測試中表現優異，都應回答：基準由誰設計、題庫如何保護與更新、評分是否由獨立第三方執行、結果能否重複驗證？開發者可以提供技術資料，卻不宜成為自己產品的唯一裁判。評測與開發需要制度上的適當分隔，否則再漂亮的分數，也難以轉化為公共信任。

須接受三個問題測試

筆者建議，任何進入公共領域的模型都接受三個問題測試。第一是替換性測試：若某個供應商或技術組件停止服務，能否在合理時間內轉用其他方案？這是避免鎖定。第二是審計性測試：獨立第三方能否檢驗數據治理、對齊過程、安全措施和實際表現？這是避免黑箱。第三是問責性測試：若模型令市民或企業受損，責任能否沿開發、部署、使用和決策鏈條清楚追溯？這是避免真空。試想一名長者因政務AI提供錯誤資格信息而延誤申請，制度若只回答「模型出錯」，卻無法交代誰須更正和補救，便稱不上可信。三個問題答不出來，不代表模型完全不能使用，但應相應限制其進入高風險和公共決策場景。

香港其實已有可信治理的雛形。數字政策辦公室公布的《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及應用指引》，涵蓋資料洩露、模型偏見、錯誤、責任和資訊保安；其第1.1版更把應用分為不可接受、高、有限和低風險四級，按風險配置禁止、合規評估、人為監督、透明、退出及審計要求。下一步不應另起爐灶，而是把這些原則轉化為業界可採用、政府可採購、市民可理解的測試、標籤和認證制度。

這正是筆者常說的「第三空間」。它不是在不同制度之間取一個模糊折衷，而是建立標準互認的接口：一端符合香港法律、國家安全、「一國兩制」和本地多語環境，另一端對接NIST人工智能風險管理框架、ISO/IEC 42001等國際治理語言。

舉例而言，一家跨國銀行在香港部署AI風控系統，可能同時面對本地



資料來源：《香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及應用指引》

監管、跨境數據和海外市場的合規要求。假如香港能提供一套獲不同市場理解和採信的第三方評測證據，價值遠高於替任何單一模型背書。憑藉普通法、金融和專業服務優勢，香港更可提供AI審計、事故調解與仲裁。香港輸出的未必只是一個模型，更可以是一張不同市場都看得懂的信任證明。

可信模型應該百花齊放。政府的角色是建立標準，而非預先選定冠軍；冠軍應由市場在公開規則下產生，而不是由採購結果倒推。公共部門採購應採取競爭中性、多供應商和可轉換原則，避免技術鎖定；公共資源亦應同時投放於粵語與本地場景基準、獨立評測、審計工具、安全算力、專門模型和初創企業。旗艦項目可以建立能見度，多元生態才能建立韌性。

AI治理具有強烈路徑依賴。今天的採購形成明天的技術標準，明天的標準又決定後天的市場結構。若可信框架建立得太慢，單一技術路徑便可能在不知不覺間成為事實標準，日後的轉換成本遠高於今天的預防成本。因此，制度建設不能等到模型大規模進入公共服務後才補課。

本港宜推動三項工作

筆者建議香港推動三項工作：其一，建立不隸屬任何模型供應者的公共AI評測平台，由技術、法律、行業及市民代表共同參與，公開方法、指標和主要結果；其二，確立公共採購的競爭中性及退出機制，所有高風險系統都須證明可移植、可替換和可追溯；其三，完善利益衝突管理，參與規則、基準或採購設計的機構須申報角色，在涉及自身產品時迴避並接受外部驗證。這不是製造壁壘，而是讓現有和未來的參與者都能公平競爭、公平被檢驗。

主權模型的價值，在於提醒香港不可失去控制；主權能力的價值，則在於即使模型更替，社會仍然握有控制。最終讓百業和市民放心使用的，不是模型的身份或標籤，而是它能否通過一致、獨立、可重複的可信考驗。

與其爭論哪個模型代表香港，不如先建立香港治理任何模型的能力。主權決定方向盤在誰手中，可信決定市民是否願意上車；而真正的主權能力，是社會可以隨時檢查、修理，必要時重塑和改良這個方向盤。

（作者為香港創科發展協會創會主席）

滬杭港金融創科合作空間廣



金融觀察

8月23日至27日，筆者率領香港金融服務界滬杭金融發展考察團，赴上海及浙江杭州進行交流考察。此行聚焦國家「十五五」規劃，以及香港首次五年規劃，並圍繞加快建設金融強國、做好金融「五篇大文章」，以及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等重點方向，與兩地金融機構、政府部門、創科企業、大學及商界代表深入交流。

在上海，筆者深切感受到當地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深厚基礎。代表團先後到訪上海證券交易所，就深化「滬港通」機制、產品創新及市場發展空間交換意見，探討在「一國兩制」框架下推進兩地制度銜接，並強化投資者服務與監管協作；在上海清算所，就集中清算、債券通及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進行交流，期盼持續完善跨境人民幣流動與清算機制，進一步發揮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樞紐的功能，共同服務環球投資者與實體經濟；代表團亦到訪上海期貨交易所並進行交流。

金融服務界期盼未來兩地能持續完善互聯互通機制，加強溝通和合作，進一步發揮香港優勢，推進兩地制度銜接，讓資本市場深度聯通，共同服務環球投資者與實體經濟。

代表團亦拜訪了上海多個政府部門與機構，就滬港兩地如何發揮各自獨特優勢、攜手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等關鍵議題展開深入討論，圍繞加強兩地政策協調、深化金融市場互聯互通，以及共同助力企業「走出去」等範疇交換意見。

期間，代表團亦參觀中國證券博物館，深入了解內地資本市場的發展歷程與歷史底蘊；並與上海相關政府部門，包括上海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及中共上海市委金融委員會辦公室等，就滬港兩地如何發揮各自獨特優勢、攜手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等關鍵議題展開深入討論。代表團亦與上海本地媒體，就如

何發揮專業財經媒體與資訊平台的獨特優勢、說好中國特別是香港金融故事展開深入研討。

杭州之行則讓筆者親身體會到當地在未來產業培育、科技成果轉化及民營企業國際化方面的蓬勃活力。代表團到訪「杭州六小龍」企業中的宇樹科技及強腦科技等前沿科技企業，實地了解當地創科企業在科研成果轉化、人工智能、未來產業培育等方面的最新技術與發展成果。考察團亦拜訪了浙江大學杭州國際創中心和經濟學院，以及西湖大學未來產業研究中心，了解浙江在創科研發與企業出海方面的戰略布局。

優勢互補 推動高質量發展

代表團此次行程的最後一站是浙江省工商業聯合會，其間深入了解眾多浙江民營企業的最新發展，以及拓展海外市場的過程中，對專業服務有殷切需求。香港擁有國際融資、資產與財富管理、法律合規、會計、保險及國際仲裁等全方位專業服務優勢，未來可更積極配合浙江企業「走出去」，協助企業善用香港平台進行上市融資、併購重組、跨境資金管理、海外合規營運及國際市場拓展。

總結此行，代表團成員皆十分投入了解和學習國家最近發展，會面時積極交流溝通，互相啟發。不僅進一步認識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、資本市場改革最新情況，亦感受到浙江在創新科技、未來產業及民營經濟方面的強大動能。展望未來，期待金融服務界持續發揮功能，推動滬杭港三地建立常態化溝通機制與更緊密的人才交流，優勢互補，共同推動高質量協同發展。

（作者為香港立法會議員）



▲由香港立法會李惟宏議員（前排中）率領的「香港金融服務界滬杭金融發展考察團」，於8月下旬造訪上海及杭州。
網上圖片

充分溝通 簡樸房落地順暢



樓市新態

簡樸房制度推行半年，截至2026年8月底，已接獲涉及逾7萬個分間單位的登記申請；約佔全港估計11萬個分間單位逾六成，登記申請進度算是十分理想。其中，8月份申請明顯上升，單月新增申請已涉及逾4萬個分間單位，反映有關的做法市民日益接受。

筆者一直同意以有管制和標準的簡樸房去取締危險、隱患處處的劏房，今次想借簡樸房例子去討論施政效果。

簡樸房制度除了凸顯政策作為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行政上的互動性強，政府諮詢市民之後有充分的吸收和互動，於是推出了寬限期、「早鳥」認證費優惠、服務隊協助申請各項房屋資源（例如過渡性房屋、單身人士宿舍、中轉房屋及臨時收容中心等），以及簡約房屋的配合，還有較為「人性化」的四年落實期限。

助業主加快改造及認證

此外，推出簡樸房樣板房展示改造方案，公開工程改造費用與時間，同時保留務實彈性，例如可容許窗戶面向天井、「黑廁」、毋須設廚房，以及水電錶設於單位內等安排，並提供改造及專業核證一條龍服務的供應商超過30間，有助業主加快改造及認證。

另外，政府透過六隊區域服務隊支援業主及租戶，包括家訪、街站、講座、填表工作坊，以及轉介涉嫌違反分間單位租務管制的個案。

以上的政策彈性，讓大家感受到

被尊重。《孫子兵法》中所謂「道」者，正是「令民與上同意也」，即是「民心」與「上下同欲」，也即是中央政府提倡的「為人民服務」了。

這令筆者想起1997年前充滿爭議的「寮仔部」（房屋署寮屋管制組），兩個時代的強烈對比，反映到時代與體制不同下的民生政策對比。二戰後大量移民湧入，香港邊邊出現大片寮屋區，為配合城市發展，港英政府曾揚言要在回歸前清拆市區所有寮屋區，僅1982年登記在案的寮屋就多達57萬間。「寮仔部」算是當年雷厲風行的行動組，有權即時清拆非法寮屋，為收回土地，會聯合警方等部門大規模行動。

當然，彼時實際環境有這樣的需要，而清拆行動同時也附帶安置政策，受影響居民可獲配公屋、賠償或工廠單位。在1995年至1996年度，政府預留了1200個公屋單位及足夠安置2400人的臨時房屋單位，但處理這民間矛盾，最重要的是互相溝通與互動，當時安置方案不如現在的香港特區政府般充裕，而溝通互動更不如現在的重視，因此拆遷過程極不順遂，甚至出現暴力抗爭。1969年馬仔坑清拆，居民甚至引發防暴隊到場。

筆者童年在徙置區長大，因而格外關心草根階層的居住處境，對此有感而發，雖然我們常就政府的施政提出意見，但如何吸收民意、互動修改達至共贏處境，在以簡樸房取締劏房這項目上，政府的而且確做得細緻且落地。希望政府繼續進步，加強與民互動，互相支持，乃市民之福矣。

（作者為祥益地產總裁）



▲簡樸房制度推行半年，登記申請與各方理想相符。圖為早年房屋局官員與業主、租客、租客代表、租客代表、租客代表等會面，聽取簡樸房管理制建議方案等意見。
政府新聞處圖片



AI研發能力。圖為早前數碼港舉行「全民智慧計劃啟動禮暨體驗日活動」。
資料圖片